

從「譯文」到「世界文學」： 以 1950 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語境為例

崔峰

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講師

cuifeng@ntu.edu.sg

郭思妤

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sykuo@ntu.edu.sg

摘要

《譯文》（《世界文學》）是一份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國家級外國文學刊物，時任大陸文化部部長的茅盾擔任首任主編。作為 20 世紀 50-70 年代中國大陸唯一公開發行的專門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期刊，它成為當時中國大陸人民瞭解、認識外國文學作品、文藝動態的最主要的管道之一。通過對這份期刊的研究，本文將 1959 年《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這一現象置於 1950 年代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環境中，借助「翻譯即改寫」的理論視角，通過分析這份期刊當時更名的原因，以及《世界文學》如何參與了譯入語語境中翻譯文學經典的重構過程，深入探討當時中國文壇以及文學翻譯如何受到政治及時代社會因素所影響。

關鍵詞：譯文；世界文學；政治；經典化；改寫

From Yi Wen to Shijie Wenxue: The Politics in Transl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

Cui Feng

Ph.D., Lecturer, Chinese Programm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uifeng@ntu.edu.sg

Arista Kuo Szu-Yu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Programm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sykuo@ntu.edu.sg

Abstract

Launched in July 1953 and discontinued on the ev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January 1966, *Yi Wen*, which literally means Translated Literature, was the only journal publishing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It is meant to serve as one of the main platform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keep abreast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latest literary trends in the world. During that time, China was dominated by Maoism and the unified communist ideology, and Mao Zedong's mandate that "literature should reflect politics" exerted ideological influences on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 state-sponsored journal run by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Yi Wen* enjoyed a long-term high "political status". In 1959, this journal changed its name from *Yi Wen* to *Shijie Wenxue*, which literally means World Literature. Up till now, in-depth case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since 1949 have been very limited and case studies of *Yi Wen* (World Literature) were especially so. According to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is a rewriting or manipulation of an original text and all rewritings reflect a certain ideology and poetics. Borrowing this concept from Lefevere,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politics in transl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estions of concern are: why did the journal change its name from *Yi Wen* to *Shijie Wenxue*? How did the journal reveal the change in China's views of "the world" in 1959? How did this journal contribut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canon?

Keywords: *Yi Wen*, *Shijie Wenxue*, politics, canonized, rewriting

壹、《譯文》(《世界文學》)的研究路徑及該期刊的發展過程

傳統的翻譯研究將原著視作判定翻譯的權威。技巧的提高、理論的分析、譯本的比較與評判，以及由此直接引出的對一個所謂「好」、「壞」翻譯家，或「好」、「壞」譯作的決斷等，都是將譯文視為原文的附屬品，譯文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這種「原著中心論」(original-text oriented)的論述模式本質上說只能算一種翻譯實踐或技巧層面的「翻譯批評」，而非學術性的「翻譯研究」。「翻譯研究」作為一種嚴肅的學術科目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開始在西方出現。以譯文為中心(target-text oriented)的研究模式將譯作從原著的陰影中「解放」出來。傳統翻譯批評中對原著過於依賴的局面得到突破。譯作成為翻譯研究中可被視作獨立研究物件的「生命體」。作為這類研究觀念的深入與發展，20 世紀 90 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被提出來之後，從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角度進行翻譯研究，讓我們看到「翻譯並不是一項『單純』(innocent)的工作，而是跟很多人的政治意識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王宏志, 1999, 頁 33-34)。「文化轉向」的一個重要成果即是對意識形態的關注，「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的權力機構和權力關係」(Tymoczko & Gentzler, 2007, p.vii)，開始進入翻譯研究的視野。在根茨勒(Edwin Gentzler)和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看來，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已經形成了「權力轉向」(power turn)(ibid. p.xxviii)，翻譯活動的背後有著「或大或小的權力操縱」，而同時「翻譯又建構著特定文化的權力結構」：因此「翻譯與權力之間的操縱互動、權力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操縱互動、意識形態與知識之間的操縱互動、知識與翻譯之間的操縱互動，形成一個內在的、互動的、迴圈的鏈條。」(ibid. pp.vii-viii)

在這樣的研究理念下，對《譯文》(《世界文學》)——這份 20 世紀 50-70 年代中國大陸唯一公開發行的、專門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期刊進行研究，成為探討當時中國大陸文壇以及文學翻譯如何對政治及時代社會因素進行回應、抵抗與角力的重要途徑。可是，長久以來，有關 1949 年以後翻譯如何受政治幹預的探研顯得十分薄弱，相關論文多流於表面論述，而缺乏深入的個案研究。對《譯文》(《世界文學》)這一重要期刊的研究更是非常有限。

《譯文》創刊於 1953 年；1959 年，更名為《世界文學》；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停刊，其間一共出版了 134 期。該期刊發表的譯作選自多達 114 個國家和民族的 1193 位元作家的作品；文學體裁涉及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報告文學、特寫、文學評論等，還包括了論文、政論等非文學體裁；其間共有 843 位譯者在該期刊上發表作品，譯作數量共計 3177 篇。它成為當時中國大陸人民瞭解、認識外國文學作品、文藝動態的最主要的管道之一。縱觀該期刊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觀察到如下線索：中國大陸以民族國家利益為立足點導致的民族國家地位的不斷提升，及其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互動，從而影響到文學話語層面政治、文學與翻譯的關係——具體表現為《世界文學》對蘇聯、歐美、「第三世界」文學譯介的不同特點。其發展的第一階段(1953 年 7 月號 - 1956 年 3 月號)處於中蘇「蜜月期」，對蘇俄文學的大力譯介成為該階段《譯文》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首要任務。1950 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民族國家意識開始在反思中不斷突顯，在遵循自身民族國家發展的經驗基礎之上，重新思考蘇聯模式對中國發展的可行性。正是基於這種對民族國家意識的反思在當時外國文學譯介中的不斷言說，《譯文》在其第二階段(1956 年 4 月號 - 1958 年 7 月號)出現了對蘇

聯「解凍文學」的大量譯介和對歐美資本主義文學的審美譯介。1958年8月，《譯文》出現了一次重要的「稿約」變動。由此昭示著《譯文》對文學作品「優秀」觀念的理解再次發生變化。曾經在《譯文》發展第二階段出現的對資本主義現代派文學進行審美、「詩學」層面的評價開始消失；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在第三階段（1958年8月號 - 1966年3月號）成為最主要的評判特徵。

本文將1959年《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這一現象置於1950年代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環境中，思考如下問題：這份期刊當時更名的原因是什麼？這一現象揭示了中國大陸怎樣的「世界觀」？《世界文學》如何參與了譯入語語境中翻譯文學經典的重構？以及如何對譯出語語境中作家、作品的文學名聲（literary fame）進行操控（manipulation）和改寫（rewriting）。

貳、問題的提出：《譯文》為何要更名為《世界文學》？

1959年1月號，在周揚的建議下《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高莽，2017，頁101）。編輯部以「編者」的名義，發表了〈從《譯文》到《世界文學》——致讀者〉一文。文中提到：「由於刊物內容有了改變，《譯文》這一名稱就不完全合適了，為了使刊物的名稱和它的內容比較一致，我們決定從開始改革內容的這一期起改名為《世界文學》（編者，1959，頁3）。那麼，「編者」所言及的革新內容主要有哪些呢？

首先，「在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為了加強刊物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我們的刊物今後主要將介紹反映現代世界各國人民的現實生活和革命鬥爭的作品（編者，1959，頁3）。

其次，

說明讀者正確選擇和理解外國文學作品的評論工作已經開始有所加強，對於外國作品的一些錯誤理解也已經在我們的報刊上及時地受到了批判。我們也將在這方面做些工作。我們的刊物將經常選擇現代世界各國社會主義文學和進步文學中的一些優秀作品，特別是激發我們讀者的共產主義革命精神的作品，推薦給讀者，並且加以分析評論，幫助他們正確地理解和欣賞，以便從裡面吸收有益的精神養料。（編者，1959，頁3）

再次，在古典文學方面：

刊物也將選擇一些在我國流傳較廣、影響較大或者值得廣為傳播的作品，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進行分析研究，指出其精華和糟粕所在，給以恰如其分的評價，以幫助讀者比較正確地對待和接受世界各國的古典文學遺產。（編者，1959）

最後，編者指出：

我們的刊物將以各種方式來加強反映世界各國文學界的情況：目前發生的重大事件，重要問題，文藝論爭，思想鬥爭等等，而且將特別注意反映國際文藝戰線上的思想鬥爭。

和作品評論一樣，這裡也將有我國文學界的同志們的發言。他們將對世界文學上的重大問題表示他們的意見，參加對國際反對的文藝思想進行的鬥爭。（編者，1959，頁3）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這篇文章裡「編者」並沒有直接交代《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的主要原因。文中所言的刊物內容的改變使得「譯文」的名稱不完全合適，那麼，不合適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非要更名為「世界文學」而不選其它名稱？名稱的更迭是否意味著這份期刊對譯作題材的擇取範圍、選擇標準又將出現新的變化？這些方面，「編者」都沒有作直接交代。

但是，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我們從《譯文》（《世界文學》）一以貫之的行刊模式、每次的稿約變化以及各階段的譯介重點可以看出，其內容的革新及《譯文》更名的最主要目的，還是要配合時代與社會發展的新需要。那麼，到了1950年代末時，這份期刊具有了怎樣「世界文學」的觀念？此時，這份期刊所擇取的譯作是否又具有了這種觀念關照下的特徵？從「譯文」到「世界文學」，在對譯作擇取標準不斷進行更新的過程中，文學與政治關係的不斷變化究竟反映了一種怎樣的文學現象？

事實上，這些問題所共同反映的，則是特定的翻譯文學作品在一定的譯入語環境中，在特定的時代裡，受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因素的影響，而被不斷「經典化」（canonized）的接受過程。佐哈爾（2001，頁24）認為，「所謂『經典化』，意謂被一個文化裡的統治階層視為合乎正統的文學規範和作品（即包括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產品被社會保存下來，成為歷史遺產的一部分。」具體而言，本文所指的「經典」（canon）指的是具有權威性和典範作用的作品。涉及到翻譯文學，既可以在譯出語語境，經過人們的長期閱讀、闡釋和評價，其作品的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跨越時間和空間而受到廣泛肯定的作品；亦指在譯入語語境中，受特定意識形態的操控和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的改寫而形成的經典作品，這類作品在譯入語語境中更多突顯的是其政治上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及對讀者的規訓作用。

1950年代末，中國大陸翻譯文學多元系統中關於「世界文學」觀念的產生，則是一些特定的翻譯文學作品在當時的政治文化語境中被「經典化」的產物——這類作品在譯出語語境中較少具有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並沒有突出的文學名聲；但在譯入語的環境裡，通過借助話語權力而成為「經典」。從「譯文」到「世界文學」就是經歷了這樣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在《譯文》（《世界文學》）這份期刊發展的不同階段，社會主義譯入語境下的文學經典被不斷建構，並最終於1950年代末期形成了中國大陸政治、文化語境在特定歷史階段中的「世界」和「世界文學」觀念。

叁、社會主義譯入語語境中對文學經典的不斷建構

佐哈爾（2001，頁202）曾言，「翻譯文學本身也有層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譯文學佔據中心位置的同時，另一部分的翻譯文學可能處於邊緣位置」。我們通過對《譯文》（《世界文學》）的研究可以觀察到，這種「中心」（centre）與「邊緣」（periphery）的位置其實僅是相對而言的：在某一時間段，受到譯入語語境中特定政治環境的影響，處於中心位置的翻譯文學就有可能被經典化。但是，一旦譯入語語境中的政治環境發生變化後，原先處於邊緣的翻譯文學就可能取代原先處於中心位置的翻譯文學，而成為新的翻譯文學的經典。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中國大陸譯入語多元系統裡，翻譯

文學仍然處於邊緣地位，因而成為「維護傳統品味的方式」，導致文學類型「作為一種僵化的系統（an ossified système d'antan）繼續存在下去」（佐哈爾，2001，頁195）。也就是說，翻譯文學成為當時主流形態建立規範、維持政權、規訓讀者的工具。與其說這裡的傳統品味是讀者的，不如說是主流意識形態強加的。在這種情況下，翻譯起到的是維持現存社會關係，授予本土主體以意識形態資格的作用；它無法改變本土主體在制度下的角色和功能，更不可能引發社會改革（Venuti, 1998, p. 78）。

1949年10月後，隨著政體的變化，配合著當時內政外交的需要，對蘇俄文學的譯介成為當時外國文學譯介的主流。而隨著共產黨成為中國大陸的執政黨，以馬克思主義原理及無產階級立場分析、研究外國文學，也終於獲得其正統、合法的地位。從《譯文》（《世界文學》）發展的第一個階段（1953年7月號-1956年3月號）可以看出，蘇俄文學佔據了此時中國「世界文學」地圖中最重要的一塊，即處於整個翻譯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此時中國大陸依附在蘇聯「老大哥」的形象之下，其所擁抱的、所理解的、所觀察的「世界」，主要就是蘇聯。值得注意的是，當這些蘇俄文學作品被冠以「進步的」、「優秀的」價值判斷後成為一個新興共產國家的文學經典時，正如施特裡齊（Fritz Strich）所言，這一跨越國界的過程仍然是一個需要擇取的過程（Strich, 1971, p. 3-4）——「日丹諾夫主義」式的反映國家社會建設和革命戰爭兩類題材的文學作品就是這一過程擇取後的結果。¹

隨著政治環境影響下文學作品「優秀」標準的變化，《譯文》（《世界文學》）進入了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1956年4月號-1958年7月號）。由於對蘇聯發展模式的質疑，及蘇共「二十大」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出現了與蘇聯的分歧，中國開始重新審視「一邊倒」及「以俄為師」的政策。這促進了中國開始反思曾經一度被遮蔽在蘇聯「老大哥」之下的民族國家形象，並通過尋求自身發展之道的方式來自我提升民族國家的政治地位。為了打破蘇聯發展模式和黨內教條主義的束縛而提出的「雙百方針」，使得195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出現了意識形態「相對弱化」的短暫時期，蘇聯的「解凍文學」也在中國文壇的「早春天氣」下進入了中國讀者的視野。除此之外，在中國的「世界文學」地圖上出現的最為顯著的一個變化就是，對資本主義文學的譯介從第一階段幾近完全側重革命的、階級的譯介立場出發，出現了從文學審美的角度選擇了一些資本主義文學世界的經典之作——包括了開闢「文學遺產」欄目，以及像《惡之花》這樣的現代派作品被介紹了進來。²資本主義文學世界的「另一扇門」被悄然打開，這也使得中國讀者注意到了資本主義文學的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我們從《譯文》（《世界文學》）在幾次擇稿要求上體現出來的變化亦可觀察出上述線索。在《譯文》（《世界文學》）第一階段1955年1月號上刊出的「稿約」中，主要內容是「歡迎蘇聯、人民民主國家及其它國家古今文學作品譯稿」（稿約，1955，版權頁）。到了1956年4月刊出的「本刊讀者意見綜述」裡，以讀者代言，要「介紹一些各國優秀的文學電影劇本」、「發表各國現代的優秀作品」（譯文，1956，頁195）。到了第二階段1956年9月號，「稿約」內容改為「歡迎蘇聯、人民民主國家

¹ 關於《譯文》發展第一階段，「日丹諾夫主義」文學、「解凍文學」的譯介情況可具體參考崔峰（2011，頁250-290）。

² 關於歐美現代主義文學以及《惡之花》在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譯介情況，可參考崔峰〈1950年代中國大陸文壇與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譯介——以《譯文》為例〉（見許綏南，2014，頁81-98；崔峰，2015，頁46-54）。

和其它國家反映人民的現實生活、思想和鬥爭的現代優秀文學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的譯稿」（稿約，1956，版權頁）。而到了1957年1月號，則進而變為「歡迎世界各國優秀的現代文學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學的譯稿」（稿約，1957，版權頁），不再著重強調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學，而是要求在世界範圍內選譯作品。

當1959年《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時，我們閱讀上文所引的這份所謂的「革新」內容，就會發現其中的多數要求並不具備「新」意。我們很容易在《譯文》（《世界文學》）發展的前幾個階段的「稿約」和「讀者來信」中找到它們的影子。誠然，《譯文》（《世界文學》）發展的諸階段都有其變化的特徵。那麼，當「譯文」發展成為「世界文學」時，究竟是怎樣的特徵導致了這種變化？這種變化應該有別於以往的階段交替，勢必包含了可以引起「質」的變化的因素在內。應該說，從「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既是對一個階段的總結，更在昭示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肆、《譯文》更名前的「先兆」：以「亞非國家文學專號」為例

值得關注的是，譯入語語境對原文及原作者的「再現」（representation），不僅僅體現在譯者的擇取過程中（如字詞句與文本層面），也同樣展現於與譯作相關的副文本（paratextual materials）³中，即包括「引言」、「註腳」、「評論」、「文學評論」等多方面（Tymoczko & Gentzler, 2007, p. xxx）。正如Kovala（1996, p. 120）所指出的，在翻譯研究中我們要特別關注副文本在文本和讀者之間作為協調者（mediator）的特殊作用，以及它們對讀者的閱讀與接受可能起到的影響。而《譯文》（《世界文學》）中的「世界文藝動態」這一欄目，正是在這份期刊以翻譯文學作品（即正文本）為主體的架構下，對讀者和正文本起著「協調」作用的「閾限協調手段」（liminal devices）（Genette, 1997, p. xi）。⁴這類手段圍繞在正文本周圍，對意義產生延伸，以再現正文本的意義（Genette, 1997, p. 1）。「世界文藝動態」對關注物件的擇取、對相關文藝活動的敘述視角與《譯文》（《世界文學》）的擇取標準緊密配合，通過「選擇性介紹」與「目的性擇取」的方式引導譯入語讀者從特定視角瞭解原作者、理解原作品及譯出語的譯介語境，與正文本的譯介內容形成呼應，從而建構起譯入語語境下主流意識形態的譯介規範。「這種翻譯規範（translational norms）在特定的階段和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普遍存在，決定了譯作的擇取標準、譯作的生產及接受」（Schaffner, 2007, p. 6）。

在整個1950年代，有關蘇聯的文藝動態幾乎是「世界文藝動態」一欄內每期必提的物件。但是，從1961年開始至1966年《世界文學》停刊的4年多時間內，僅在1962年5月號、10月號及1964年4月號的「世界文藝動態」內提到了蘇聯的文藝情況。取而代之的是有關亞、非、拉等處於民族解放鬥爭高潮中的「中間地帶」國家⁵。而同時，

³ 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副文本概念和理論（參考其著 *Seuils*, Paris:Seuil）在西方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正如Kovala（1996, p.120.）所指出的，熱奈特忽視了對文學翻譯的研究。Urpo Kovala、Richard Watts 和 Şehnaz Tahir-Gürçağlar 等學者將副文本研究引入了翻譯研究中。

⁴ 按照熱奈特的觀點，《譯文》（《世界文學》）配合著相應的翻譯文學作品所繪製的插圖（illustrations）也屬於副文本。我們亦可研究這類副文本是如何對譯入語讀者的閱讀與接受產生影響的。

⁵ 「中間地帶」的理論最初是毛澤東在1946年同美國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的談話中提出的。（見毛澤東，1991，頁1193）。

亞、非、拉國家的文學作品譯介數量較之於 1950 年代處於明顯上升態勢，並在 1960 年代完全取代了蘇聯文學，成為當時《世界文學》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的主流，佔據了翻譯文學系統的中心位置。而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讀者視野的蘇俄文學也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於 1960 年代開始逐步並最終完全消失。在 1950 到 1960 年代間，蘇俄文學歷經了在翻譯文學系統中從中心到邊緣、直至離開這個系統的過程。可以注意到，從《譯文》（《世界文學》）第一階段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文學，及資本主義「左翼文學」⁶的「擁抱」，到第二階段資本主義國家其它形式和性質的文學（尤其是現代派）的出現，如果從「國別文學的總和」這一角度理解「世界文學」的話，唯獨缺少的就是處於兩大陣營中間的亞、非、拉國家文學了。當 1950 年代後期，中蘇分歧日益擴大並最終導致兩國同盟關係破裂和社會主義分裂——在分裂之前，「中共已經從一個在莫斯科指揮下的支部成為與蘇共並列的國際共運的領導者和理論權威」（沈志華，2013，頁 228）⁷。美國情報機構當時分析道：中國自身力量和自信心的不斷增強，增加了中國在處理中蘇關係中的魄力，導致中蘇關係分歧的急劇增加，並同時使中國對前途的展望與態度投向了非共產主義世界（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960）。可以說，在新的國際和國內形勢下，中國對民族國家地位進一步反思後，已然將民族國家形象置身於更為廣闊的空間，不僅視自己為社會主義陣營內的一支領導力量，更將民族國家的視野突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範圍而擴大至兩大陣營間的諸多「中間地帶」國家，並且要自覺地擔當起「世界革命」的重任，亦與蘇聯展開對「第三世界」影響力的爭奪⁸。從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始，蘇共的整體形象「黯然失色」，而「中共和毛澤東的地位則蒸蒸日上，其影響所至，不僅遍及亞洲，而且擴大到歐洲」（沈志華，2013，頁 228），國際共運系統的領導原則由「以蘇聯為首」客觀上變了「以中蘇為首」（沈志華，2013，頁 256）⁹；1960 年 11 月 81 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最重要的進展」即是中國共產黨對蘇聯領導地位的「挑戰」（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1, p. iv）。因而，1950 年代末期，正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變革之際，也恰是中共領導人的「世界觀」發生重大改變之際——當然這種新的「世界觀」的形成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此時，在新「世界觀」的視野之下，《譯文》開始將譯介的目光大規模、集中性地集中到「中間地帶」國家時已是題中應有之義，亞、非、拉國家文學則如同前兩個階段其它國家、形式的文學一樣，在佔據了翻譯文學系統中心位置後，成為了意識形態操控下的「經典化」文本。雖然此時，在這種「經典化」的擇取過程中，蘇聯文學及一些從審美、詩學角度早已被廣泛視作「經典」之作的文學遺產被排除在了新的社會主義文學經典的範疇之外，但這一過程恰是在中國的內政外交具備了更為開闊、完整的「世界」視野後，反映在文學話語上的結果。

⁶ 就《譯文》（《世界文學》）的譯介對象而言，「左翼文學」主要體現為具備共產黨員身份或與共產黨關係密切的「左翼文學」作家所創作的兩類作品：第一類是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現象，表現底層勞動者困頓的生活遭際，反映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作品；第二類則是憧憬種族平等，號召全世界「被壓迫者」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作品。

⁷ 美國情報機構指出：自史達林去世之後，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影響力急劇增加，在共產主義陣營裡扮演了突出角色（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1957）。

⁸ 在史達林統治蘇聯後期（1946-1953），蘇聯對「第三世界」的關注始終處於次要地位。但自赫魯雪夫上臺之後，開始加大對「第三世界」軍事、經濟援助（1958-1960），並於 1961-1964 年達到高潮，以此抗衡西方世界。（可參考 Hosmer and Wolfe, 1982）可以說，在這一點上蘇聯的政策與中國一致，隨著中蘇分歧加劇，兩國對第三世界影響力與領導力的爭奪成為必然。

⁹ 一明顯例證即是「波匈事件」後周恩來的穿梭外交取得巨大成功，提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 and 影響。1957 年蘇聯官方檔列舉的社會主義國家將「蘇聯和中國排在首位，其他國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中共威望已經與蘇共齊名，成為各國學習的榜樣。（沈志華，2013，頁 274。）

由此可見，《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確非一蹴而就，這一現象的產生與當時外在的社會政治環境息息相關。可以注意到，《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的前兩期，為了配合亞非國家作家會議的召開，《譯文》（《世界文學》）在 1958 年 9 月號與 10 月號，連續兩期開闢了「亞非國家文學專號」。雖然在《譯文》（《世界文學》）的第一、二階段不乏對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文學作品的譯介，但是，同時對亞非國家文學展開了大規模、集中譯介，在《譯文》（《世界文學》）發展過程中尚屬首次。可以說，這一譯介形式的安排，為緊隨其後的期刊更名作了注腳和鋪墊。

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兩期「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主要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譯作和作家的數量多，涉及的國家數量多、分佈廣，且多數國家的作品屬第一次在《譯文》上得以譯介，足見編輯部對該期專號的重視與精心編排。在整個《譯文》（《世界文學》）的第三階段，平均每期共刊載譯作 22.94 篇。而 1958 年 9 月號「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上）」中，即刊載譯作 52 篇；1958 年 10 月號「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下）」中，即刊載譯作 36 篇。譯作數量遠超於第三階段各期的平均譯介數。

同時，我們再觀察譯出語國家的情況：在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上）中共譯介了來自印度、日本、黎巴嫩、伊拉克、印尼、緬甸、泰國、菲律賓、土耳其、蘇聯（亞）、伊朗、敘利亞、尼泊爾、以色列、阿笛布、沙烏地阿拉伯等 16 個亞洲國家，及埃及、阿爾及利亞、南非、塞內加爾、莫三鼻給、馬達加斯加、象牙海岸、法屬幾內亞、賴比瑞亞、衣索比亞、西非、班圖等 12 個非洲國家的文學作品，有名有姓的作家達到 39 位之多。從這份國別名單中我們可以注意到，對其中的亞洲國家而言，這些國家分佈於東亞、東南亞、中亞、西亞等整個亞洲地區，其中除了在世界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印度和日本的文學作品經常性地在《譯文》上刊載以外，本期還首次擇取了黎巴嫩、泰國、伊朗、尼泊爾、阿笛布及沙烏地阿拉伯的作品；在非洲國家當中，本期擇取的國家分佈於東北非、北非、南部非洲、西部非洲、東非海岸島國、赤道非洲等整個非洲大陸，其中除了擁有悠久文學文化歷史的埃及以外，其它諸如塞內加爾、莫三鼻給、馬達加斯加、象牙海岸、法屬幾內亞、賴比瑞亞、衣索比亞、西非與班圖等在世界文學史上鮮有經典文學作品傳世的非洲小國的文學作品均首次在《譯文》（《世界文學》）上出現。

在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下）中，雖然譯出語國家均為朝鮮、越南、蒙古及蘇聯（亞）等亞洲地區的國家，但有一現象尤其值得注意。眾所周知，蘇聯是一個由 15 個加盟國組成的聯盟國家，其中包括了諸多地處亞洲地區的加盟國。在「亞非文學專號」出現之前，《譯文》（《世界文學》）將所有譯出於蘇聯成立之後，且出自蘇聯地區的文學作品，均統一歸納至蘇聯之下。甚至在 1957 年 8 月的「亞洲文學專號」中，也沒有一部作品是出自蘇聯成立之後的亞洲地區加盟國。但是在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下）中，《譯文》卻在刊載相關譯作的同時，首次具體列舉了蘇聯亞洲地區加盟國的名稱，其中包括了烏茲別克、格魯吉亞、韃靼、亞塞拜然、塔吉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巴什基裡亞。《譯文》這一有意識地以地域性來「分裂」蘇聯的現象，正體現了《譯文》在由於歷史與政治的原因，而對蘇聯文學長期投入最主要的譯介精力後，在外在政治環境發生新的變化時，試圖對譯出語國家的擇取重新進行調整的態勢。這也昭示著《譯文》將把譯介的目光轉身蘇聯之外的亞、非等地區的諸多國家中，從而配合政治形勢的變化，改變蘇聯文學在《譯文》上長期「一家獨大」的局面。

其次，此兩期專號的出現，肩負著鮮明的政治意義。正如茅盾在「專號（上）」的開篇論文《為了亞非人民的友誼和團結》中所言，編輯「專號」的首要原因，即是「歡迎亞非國家作家會議」。而亞非國家作家會議的召開，正契合了「亞非人民反殖民主義鬥爭」「空前高漲」的形勢——美英武力侵略黎巴嫩和約旦「給參加會議的所有作家提出了現實的課題」：誰在進行「新戰爭陰謀」？誰在進行殖民主義、危害了各民族「獨立自主的權利」？（茅盾，1958，頁2）

因而，正是因為需要配合上述茅盾所言的政治意義，「專號」中所擇取的作家、作品則需要具有一定的政治標準、反映與當時政治形勢相關的主題思想；而文學作品的詩學、審美因素，以及作家本身是否在世界範圍內具備一定的文學名聲均不是「專號」擇取譯作時主要的考量標準。因而，「專號」對文學作品的擇取標準將勢必圍繞能夠體現反美英殖民統治、反民族侵略及提倡世界和平的主題。

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上）主要由三部分內容組成：「現代阿拉伯詩選」、「現代非洲詩選」，及其它亞洲國家的文學作品。作品體裁以詩歌和小說，另包括了少量的民間故事和劇本。以前兩個專欄為例，其中「現代阿拉伯詩選」專欄中刊載了5首詩作。「現代非洲詩選」中共刊載了11首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譯文》在譯作擇取標準上體現出來的幾個特點：

首先，從所擇取譯作的內容來看，這些作品極大程度地體現了作品所能展現出來的「現代」意義。自西元6、7世紀始，在阿拉伯文學中就湧現出大批詩人，尤其是伊斯蘭前的阿拉伯吟唱詩出現了讚頌、諷刺、抒情和哀悼等多種主題的表現方式，成為阿拉伯文學遺產中重要組成部分（王廣大，1998，頁36）。但很明顯的是，這些古典文學作品的時代性及其表達的主題，由於無法直接體現「二戰」以後，「非洲人民爭取自由獨立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更不能表現「萬隆會議和埃及獨立以後」非洲及阿拉伯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在「當下」所具有的政治意義，而被《譯文》排除在擇取的範圍之外。正如譯者鐵弦所言，譯載這些阿拉伯、非洲國家的文學作品，即是要「迎接亞非作家會議的召開」，以表現該地區「民族解放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譯後記，1958，頁19）。因而，我們注意到，在「阿拉伯詩選」及「非洲詩選」中無一例外地譯介了20世紀上半期「現代」阿拉伯、非洲詩人的作品。其主題及表現形式為了配合當時非亞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就非常自然地主要集中在了三個方面：其一，抒情類的詩作：抒發了詩人對非洲土地、祖國及人民的熱愛之情；其二，描寫性的詩作：表現該地區人民受殖民統治和被「帝國主義掠奪和壓迫下」（譯後記，1958，頁19）的悲慘遭際；其三，鼓動性的詩作：號召受奴役人民起來反抗，爭取民族與國家的獨立。

再者，正是因為「專號」擇取譯作的首要標準是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意義，而使得《譯文》可以忽視文學作品是否具備詩學或審美因素；這也就造成了這批詩作在表現手法上的單調，政治主題的突顯對比出詩作在意境表現、韻律使用上的蒼白與無力。其作者也大多在世界文學範圍內藉藉無名，或是其相應的「文學名聲」並不是通過對詩作在詩學、審美上的追求與表現而建立起來的。比如諾羅尼亞雖然被視作莫三鼻給的「著名詩人」（譯後記，1958，頁19），但是他「文學名聲」的建立是基於其擅長創作具有鼓動作用的反抗性詩歌；出身貧苦農民的達吉耶的主要身份更是一名非洲文化、政治的活動家，而非一名職業作家。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一個現象，這類由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文學經典經過了一個由文學層面的非經典性到政治層面的經典

化過程。在這個建構過程中，除了國家話語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操控外，作為專業人士的編者、譯者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共謀」(conspiracy)；他們通過對原作目的性擇取、對譯者選擇性的介紹(如在介紹法共現代派作家時，編者和譯者有意忽略了對他們現代派作家身份的介紹，而突現了其作為共產黨員的「進步」身份)、對讀者有引導性的閱讀接受(即通過該期刊的「譯後記」、「編後記」、「後記」、評論等部分)對原作進行「改寫」。其中，作為專業人士的譯者又對讀者的閱讀品味(literary tastes)進到了決定作用——這種文學品位有譯者「信譽的保證」，體現了對此外國文學有興趣的讀者「有較強的鑒賞力和淵博的知識」(Venuti, 1998, p. 76)。而作為當時中國大陸「惟一一種介紹外國文學的刊物」、「最高發行人曾達到數萬，甚至更多」的《譯文》(《世界文學》)而言，讀者的廣泛閱讀、評論與回饋(如「讀者來信」)則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推動了經典本土化的建構過程。如果說編者、譯者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對經典化的建構是一種有意識的「共謀」，那麼廣大讀者則是無意識地參與到了這種建構過程中。

此兩期「亞非國家文學專號」所表現出來的第三個特徵，即是對作品表現出來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徵的重視。從上文所梳理的諸多譯出語國家地域分佈特點中，這一特徵即可顯見。尤其值得一提的，如上文所及，1958年10月的「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下)」中，首次出現了為了突顯譯出語國家的地域性特徵，而將蘇聯亞洲地區加盟國的名稱單獨列出的現象。在該期總計32篇文學譯作中，譯自蘇聯亞洲地區的文學作品達到22篇。從對《譯文》(《世界文學》)第一、二階段有關蘇聯文學作品的譯介中我們已經看出，從整體上反映蘇聯作為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歷程和建設成就是這些譯作主題的主要組成部分；同時，在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下，「解凍文學」成為1950年代蘇聯文壇的一大思潮。可以看到，受當時中國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影響，當這批蘇聯文學作品被大規模譯介進中國文壇時，《譯文》(《世界文學》)對這些作品的譯介視角反映的還是將蘇聯作為一個整體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來對待，從而體現出當時中國向一個強盛的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整體態勢。即使受中、蘇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而使得在主題反映、寫作手法上有所區別的「解凍文學」進入中國文壇時，這一整體視角仍舊沒有改變。蘇聯文學作品之所以能長期在《譯文》(《世界文學》)上一家獨大，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趨同性的認可，無疑是譯入語語境擇取蘇聯譯作的主要標準。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可以團結多民族、跨地區國家的整體概念，則必然導致了中國文壇對蘇聯文學呈現「整體態勢」的譯介視角。在1957年11、12月的「蘇聯文學專號」中，直接將蘇聯作為敘述、歌頌、表現的整個物件的文學作品就有13首詩歌和一篇小說。

但這一整體譯介視角卻在「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下)」中出現了「鬆動」。在《譯文》(《世界文學》)的發展過程中，首次出現了針對蘇聯文學中地域性、民族性特徵集中譯介的現象。這一特點在該期擇譯的詩歌中得到明顯體現。塔吉克詩人土爾松—查德(1958, 頁70)在《亞洲的聲音》中以「我們的亞洲」為詩作敘述的立場與主體，號召「亞洲大陸首先為自由挺起身子」，並稱頌了中國、印度、印尼等亞洲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抗爭經歷。《譯文》(《世界文學》)曾在「蘇聯文學專號」中擇取過托康巴耶夫的《我的祖國》，而在本期專號中，則譯介的是托康巴耶夫的《我的吉爾吉斯坦》，譯介視角由原先對蘇聯作為一個統一國家的稱頌，而轉向了對詩人所屬民族吉爾吉斯坦的歌頌。

此外，在對世界文學遺產的譯介中，也突顯了對塔吉克民族文學遺產「四行詩」的譯介。蘇聯塔吉克共和國於 1958 年隆重紀念了魯達基（Abu Abdollah Ja'far Rudaki）誕辰 1100 周年。作為一千多年前的波斯詩人，魯達基的文學貢獻主要體現在「塔吉克文學的始祖」、「塔吉克古典詩歌和伊朗古典詩歌的奠基人」（戈寶權，1958，頁 90）等層面。戈寶權（1958，頁 91）在本期刊載的論文《塔吉克文學的始祖魯達基》正是著眼于魯達基的詩歌創作成為「塔吉克人民和伊朗人民的珍貴的文學遺產」——這一突顯其文學影響民族性和地域性特點的視角展開譯介，而並非將其視作蘇聯文學遺產的組成部分。這種《譯文》對蘇聯地區文學遺產進行轉載的同時，發表對於該文學遺產的評論，在該期刊的編排中也屬首次出現，從而更加體現了《譯文》對那些可以突顯民族性、地域性特徵的文學作品的重視。

從《譯文》對兩期「亞非文學專號」的精心編排及其體現出來的三個特點中，我們已然可以注意到，亞、非國家等「第三世界」文學已然開始受到《譯文》的有重點、有系統地關注。這樣預示著，在歷經了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導向，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文學長期重點譯介的階段後，《譯文》對擇作的擇取標準、範圍和目的，都將重新進行調整。因而，亞、非等「第三世界」文學在長期居於譯入語翻譯文學系統的邊緣後，取代蘇聯文學而居於系統的中心位置，也就為期不遠了。

伍、結論

通過分析以上譯介態勢的變化，我們看到譯入語語境中，對「文學經典」的重新定位與理解。正如佐哈爾（2001，頁 27）所認為，對譯入語文化、文學系統的進程來說，「經典」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一個「動態」（dynamic）的概念。從《譯文》（《世界文學》）的整個發展過程，包括「稿約」和該雜誌對譯作擇取標準的變化，以及「譯文」最終更名為「世界文學」，我們看到的正是「文學經典」的概念在譯入語語境中隨著文化、政治語境的變化而呈現相應變化的「動態」性。這一動態性的產生，反映的正是《譯文》（《世界文學》）發展至第三階段時，中蘇權力關係的變化導致的文學話語的調整。1950 年代末期，在國際與外交形勢的影響下，立足於民族國家利益的考量及對民族國家地位的不斷反思，中共領導人儼然形成了新的世界觀，對世界格局及其與中國的關係進行重新思考與佈局。反應到文學話語上，即是《譯文》（《世界文學》）在長期「擁抱」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作品，著力譯介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進步文學」，及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短暫譯介後，把譯介重點轉向了亞非拉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開始了這份期刊的第三個發展階段——從而彌補了其「世界文學」版圖上長期大規模缺失的一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世界文學」版圖。事實發展亦顯示，通過對亞非拉等第三世界文學的大規模譯介，中國大陸的文學話語開始以毛澤東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周揚，1997，頁 524）。代替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口號（尤以 1960 年 4 月號的《世界文學》為標誌，時值中蘇交惡公開化的關鍵時期¹⁰，《世界文學》在封面和目錄後的書頁中接連刊出兩幅列寧畫像，並在開篇辟出“偉大的列寧誕生九十周年紀念”專欄，以高姿態支持中共對蘇聯的批判，亦開始通過「反美鬥爭特刊」（1960 年 6 月號）用亞非拉文學作品對抗資本主義陣營。一言以蔽之，從「譯文」更名為「世界文學」，該

¹⁰ 從目前解密的檔案可以觀察到，中蘇關係的破裂開始逐步公開化主要在 1959-1960 年間；而在此之前，雙方的爭執都尚局限在內部。

期刊以文學話語的表達形式來反應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是政治的、革命的、意識形態的，是基於民族國家立場的。

此外，從《譯文》（《世界文學》）于「文革」停刊前所經歷的三個階段來看，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一是，我們在承認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發展影響，文學依附政治的同時，亦不可忽略了文學活動自身也存在著其相對獨立的一面。也就是說，即便是在意識形態高度集中的威權政治體制之下，前者對後者的作用也並非絕對。就翻譯文學的發展而言，仍然存在著翻譯家、編輯部相對獨立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從而突顯了文學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正如杜然所言：

在「文革」之前，儘管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文學是主流，但仍有很多西方作家的作品出現在這本雜誌上，比如亞瑟·米勒、威廉·福克納、海明威、薩特、桃莉絲·萊辛（20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英國作家）等現當代作家。（杜然，2009/2009）

翻譯家傅惟慈針對這一現象「日後感歎」，「我這一代人才沒有與外部世界完全脫節」（杜然，2009/2009）。對於這段時間的雜誌內容，時任《世界文學》主編余中先也說，「雖然有意識形態的干擾，但還是有很多好東西」（杜然，2009/2009）。但是，這些在譯出語境中的經典作品卻在譯入語境中被「非經典化」（decanonized），「意謂被這個階層視為不合正統的規範和作品，其產品通常最終被社會遺忘（除非其地位有所改變）」（佐哈爾，2001，頁24）。即便如此，在當時譯入語境中翻譯家、編輯部相對獨立的「主體性」與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互動關係，展現的正是「經典化的文化與非經典化的文化之間的張力」，「雖然支配語言系統規範的主流意識形態不容許明確地考慮經典化階層以外的任何其他階層，但世界上根本沒有不分階層的語言」（佐哈爾，2001，頁24）。這些不同階層共同構成了譯入語的多元系統。

其次，即使我們在將研究重點關注到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這一層面，也應該注意到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對文學的影響仍然體現了它的多變性。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十七年」已經習慣性地被研究者概括為1949—1966這一階段。當然這一概念的出現，主要是基於這一時期由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度集中所呈現出來的，政治對文學的深刻影響以及文學對政治的高度依附這一特徵。但即便如此，從對《譯文》（《世界文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在「十七年」間，由於國家內政外交方針的不斷變化，也使得這份翻譯文學期刊在不同的階段出現了不同的發展特徵，對「稿約」內容的屢次變更即是最好的說明。而這種發展特徵，也使得「譯文」最終走向了「世界文學」。

致謝

本論文的部分寫作內容獲得新加坡教育部項目 AcRF Tier 1 Project RG147/16 (NS) (Transl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ts Significance to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的資助。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中文書籍

毛澤東（199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宏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

沈志華（2013）《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1956—1957年的中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周揚（1997）〈新民歌開拓了詩歌的新道路〉。見馮牧（編）《中國新文學大系 1949—1976·文學理論卷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高莽（2017）《高莽自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崔峰（2011）〈「日丹諾夫主義」與 1950 年代上半期的中國文壇——以《譯文》為例（1953 年 7 月號—1956 年 3 月號）〉。見王宏志（編）《翻譯史研究 2011》（頁 283—29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崔峰（2014）〈1950 年代中國大陸文壇與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譯介——以《譯文》為例〉。見許綏南（編）《南天文薈 2014 英語文教學新樣貌台南大學 2014 英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頁 81—98）。台南：台南大學。

中文報紙

杜然（2009，3月2日）《名叫〈世界文學〉的刊物》。見 http://www.eeo.com.cn/Business_lifes/Art/2009/02/26/130410.shtml（2009年3月2日）（原載《經濟觀察報》，2009，2月20日）。

中文期刊論文

戈寶權（1958）〈塔尼克文學的始祖魯達基〉。見《譯文》，10月號。

王廣大（1998）〈伊斯蘭前阿拉伯詩歌的特點〉。見《阿拉伯世界》，9。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2001）〈多元系統論〉、張南峰譯。《中外文學》，30：3。

米·土爾松—查德（1958）〈亞洲的聲音〉、張孟恢譯。見《譯文》，10月號。

茅盾（1958）〈為了亞非人民的友誼和團結〉。見《譯文》，9月號。

崔峰（2015）〈別樣綻放的「惡之花」：「雙百」時期《譯文》的現代派文學譯介〉。見《東方翻譯》，2，46—54。

稿約（1955）。見《譯文》，1月號，版權頁。

稿約（1956）。見《譯文》，9月號，版權頁。

稿約（1957）。見《譯文》，1月號，版權頁。

編者（1959）〈從《譯文》到《世界文學》〉。見《世界文學》，1月號。

譯文（1956）編輯部整理《本刊讀者意見綜述》，195。

譯後記（1958）見《譯文》，9月號，頁 19。

英文書籍

- Even-Zohar, I. (2004).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enette, G. (1997).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Vol. 20) (J. E. Lewin, Tra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smer, S. T. and Wolfe, T. W. (1982). *Soviet Policy and Practice toward Third World Conflicts*. Toronto: Lexington.
- Schaffner, C. (2007). *Translation and Norm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Strich, F. (1971). *Goethe and World Literatur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Tymoczko, M. & Gentzler, G.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Press.
- Venuti, L.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英文期刊論文

- Kovala, U. (1996). Translations,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 In *Target*, 8:1, 119–147.

英文政府文件

-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57, Communist China through 1961, Discussion 40*. Washington, D.C: Author.
-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00-3-60, Sion-Soviet Relations, Conclusions 1*. Washington, D.C: Author.
- The Sino-Soviet Dispute (The 6 December Declaration, and Soviet and Chinese Presentations of It) (1961, March 17).

附錄：「亞洲文學專號」刊行內容

作品	體裁	作者	國別	譯者	頁數
亞非國家文學專號（上）					
為了亞非人民的友誼和團結				茅盾	2
現代阿拉伯詩選					
禮贊收復的失地	詩	艾·福德	阿聯（埃）	馬真	4
占領軍	詩	哈·白雅帖	伊拉克	白羅	7
面包詩	詩	尤·薩依德	黎巴嫩	烏蘭汗	8
問題尖銳地擺在面前	詩	庫龍夫裏	阿聯（叙）	張孟恢	9
英雄的壯語	詩	海丁	阿爾及利亞	斯蘭	10
現代非洲詩選					
山嘉納、真實的愛情之歌	詩	米凱亞	莫三鼻給	史敏	11
起來，行動吧！	詩	諾羅尼亞	莫三鼻給	史敏	14
你就是主人、擦幹你的眼淚吧！	詩	達吉耶	象牙海岸	鐵弦	14
受不了呵，窮苦的黑人（外二首）	詩	狄奧普	塞內加爾	鐵弦、誌平	17
非洲的氣候	詩	克哈裏	法屬幾內亞	鐵弦	18
戀歌	詩	蘭納依沃	馬達加斯加	鐵弦	18
祖國	詩	拉勃馬南查拉	馬達加斯加	沈寶基	20
*					
我們的回答、期待、列寧墓	詩	瓦拉托爾	印度	孫璋	32
籠中鸚鵡	詩	鮑地亞拉雅	尼泊爾	趙樸初	35
沉思	詩	沙赫裏雅爾	伊朗	盧永	37

秋雨	詩	沙·愛拉米	伊朗	盧永	37
自由	詩	達裏亞	伊朗	盧永	38
希望勝過絕望	詩	阿·阿敘爾	以色列	烏蘭汗	39
他的面孔	小說	克·錢達爾	印度	馬清槐	40
家庭的名譽	小說	布·薩赫尼	印度	金人	45
黃昏的贈禮、 每月 45 個盧 比	小說	納拉衍	印度	嚴紹端	52
狐（中篇小 說）	小說	野上彌生子	日本	馮明、簡 塵	61
幽靈列車	小說	廣津和郎	日本	伍仲	91
夜間的營火	小說	西野辰吉	日本	張夢林	97
鋼鐵的戰線	小說	哈米西	阿聯 （埃）	呂潔	107
劊米亞特·劊 馬利亞特	小說	哈米西	阿聯 （埃）	秦水	115
達爾費裏	小說	馬·帖木爾	阿聯 （埃）	付克	124
舊槍	小說	米·奈吉邁	阿聯 （埃）	馬賢	131
鎖鏈	小說	達克魯勃	黎巴嫩	陳次園	134
釋放	小說	法爾曼	伊拉克	王世清	138
在咖啡店裏	小說	狄布	阿爾及 利亞	藍冰	145
伊妮姆	小說	杜爾	印度尼 西亞	陳觀梅	153
捕魚人	小說	杜卡	緬甸	白澄	162
小孩	小說	伊沙努巴於嗟	泰國	莊思齊	165
他的囚犯	小說	拉·巴拉斯	菲律賓	楊友	168
尾巴的故事、 我是怎樣自殺 的	小說	阿·涅辛	土耳其	王雨	173
杜恩弗雷的主 人	小說	納勒第	南非聯 邦	裴匡麗	182
血和地毯	劇本	阿笛布	巴基斯 坦	金克木	189
聰明的阿布麥 華士	民間 故事		沙特阿 拉伯	奇青	196
蜘蛛的腰怎樣 變細的	民間 故事		利比裏 亞	劉慧琴	198
糊塗丈夫和聰 明老婆的故 事、兩個狡猾	民間 故事		埃塞俄 比亞	楊誠	199

人

饑荒中的烏龜 和狗、為什麼 鱷魚不肯死在 水裏	民間 故事		西非	秋斯	205
鳥姑娘們	民間 故事		班圖	陳中輔	207
薩迪《薔薇 園》創作七百 周年紀念	故 事、 格言	薩迪	伊朗 蘇聯	水建馥	213
薔薇園 薩迪的最後一 個春節	小說	伊薩克揚	(亞)	戈寶權	222
薩迪名作《薔 薇園》的世界 意義	論文	布拉金斯基	蘇聯	張鐵弦	226
世界文藝動態					233
亞非國家文學 專號(下)					
克什米爾之歌	小說	拉希多夫	蘇聯 (烏茲 別克)	家驥	2
友誼	小說	捷特吉尼節	蘇聯 (格魯 吉亞)	付克	23
在軍醫院裏	小說	阿·薩莫夫	蘇聯 (韃 靼)	施友松	34
邏輯迦沙諾維 奇	小說	伊勃拉吉莫夫	蘇聯 (阿塞 拜疆)	水寧尼	42
幸福	小說	金北鄉	朝鮮	金聖哲	50
礦工歸來	小說	武輝心	越南	開叔	59
羊羔和小孩	小說	達姆丁蘇榮	蒙古	剛紀	66
亞洲的聲音	詩	土爾松一查德	蘇聯 (塔吉 克)	張孟恢	70

我為人民服務	詩	江布爾	蘇聯 (哈薩克)	戈寶權	73
我的吉爾吉斯坦 (外一首)	詩	托康巴耶夫	蘇聯 (吉爾吉斯)	戈寶權	75
社會主義(外 二首) *	詩	斯塔爾斯基	蘇聯 (巴什基裏亞)	陸風	78
不,我還不是 爺爺!	詩	加弗裏	蘇聯 (巴什基裏亞)		80
站在列寧身邊	詩	素友	越南	任嘯	81
“統一”鏡子	詩	瞿輝近	越南	章純	82
情誼	詩	金舜石	朝鮮		83
在追擊敵人的 道上	詩	姜立石	朝鮮		84
雄鷹之死	詩	德·僧格	蒙古	丁師灝	84
海	詩	拉姆蘇榮	蒙古	烏蘭汗	85
魯達基誕生一 千一百周年紀 念					
四行詩十章	詩	魯達基	蘇聯 (塔吉克)	戈寶權	87
塔吉克文學的 始祖		戈寶權			90
亞非國家文學 概況					
談阿拉伯文學 憤怒與希望的 非洲(談現代 的非洲詩)	論文	B·舒斯捷爾	蘇聯	落英	92
戰後日本文學	論文	加爾培裏娜	蘇聯	衷維昭	104
印度尼西亞現 代文學	論文	藏原惟人	日本	祖秉和	118
張演	論文	張演			129
蒙古的現代新 文學	論文	丁師灝			133

朝鮮革命文學 的新高漲	論文	陶冰蔚			138
保衛布希列德 修正主義思想 批判	特寫	喬治·阿爾諾	法國	馬清槐	144
				中央委 員會文 化理論 工作組 高恩 德、包 多金、 李愨	
關於民粹 派作家 世界文藝 動態	論綱	社會 主義 工人 黨	匈牙利		157
					165